

高人雄 著

北朝民族文学叙论

上册

中华书局

高人雄 著

北朝民族文学叙论

上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朝民族文学叙论/高人雄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11.5
ISBN 978-7-101-08070-4

I. 北… II. 高… III. 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北朝时代 IV. I20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2948 号

书 名	北朝民族文学叙论
著 者	高人雄
责任编辑	俞国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41 插页 18 字数 650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8070-4
定 价	98.00 元

小 引

刘跃进

公元 300 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带有转折性的年份。这年四月,晋赵王司马伦起兵杀贾后及其追者,自封相国。次年废晋惠帝,自立为帝。齐王、成都王、河间王等等起兵讨伐,赵王败死,同盟者又相互火并,“八王之乱”由此拉开大幕。此后十余年,内忧外患,五胡乱华,最终导致西晋衰亡,“五马渡江”。此后,北中国大半壁江山,长期陷于混乱。与东晋并峙的十六国以及崛起于大兴安岭地区并逐渐入主中原的北魏,还有分裂而成的东魏、西魏及其继承者北齐与北周等,北方数十个少数民族,接踵比肩,你唱罢来我登场,扮演了一幕幕令人扼腕的史剧,直至公元 589 年隋文帝统一中国,这出史剧才算谢幕。而北方各民族的文化血脉依然在延续着,并融入到盛唐文化中。鲁迅说,“唐室大有胡气”(《致曹聚仁书》,1933 年),大约就是指此。甚至,我们还可以扩大说来,正是东汉末叶以来北方各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造就了灿烂的唐代文明。

唯其如此,北朝的历史与文化,历来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涌现出许多大家与名家。相比较而言,有关中古时期北方文学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曹道衡先生一度把他的研究重心放在北朝,在《文学遗产》等重要刊物上陆续发表《试论北朝文学》、《十六国文学家考略》、《关于北朝乐府民歌》、《从〈切韵序〉推论隋代文人的几个问题》、《读贾岱宗〈大狗赋〉兼论伪〈古文尚书〉流行北朝的时间》等文章,其后,又与沈玉成先生合著《南北朝文学史》,负责北朝文学史的撰写,将过去被视为“文学作品几乎绝迹”的十六国及其以后的北方文学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纵横比较,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意义的创见,厘定了北朝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这些研究成果,多已收录在《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以及《汉魏六朝文学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中古文史丛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等,代表着近三十年来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追随曹道衡先生求学问道,略知北朝历史文化的复杂多变。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必要的知识储备,没有系统的资料梳理,没有清晰的理论思考,贸然闯入,往往会眼花缭乱,信口雌黄,就好像《左传·隐公四年》所说:“犹治丝而棼之也。”基于这样一种感知,我对于高人雄教授的《北朝民族文学叙论》一书充满阅读的期待。

这部著作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成果,申请项目时名曰《北朝民族文学研究》,著作出版书名《北朝民族文学叙论》,似乎更加准确。北朝民族文学研究,所包涵的题义更加宽泛。研究有不同层次,有资料收集整理层面,也有综合归纳层面,更有上升为理论建树的层面。而该著是对中国北方这个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首次进行系统的收集、归纳和综述,叙中有论,夹叙夹论。书名叙论更为明朗确切。该著前六章是以叙为主,作者尽可能客观全面的陈述当时人主中原的氏、羌、羯、匈奴、鲜卑等诸民族的文学现状,叙中有论,论是为了透过有限的资料发掘内在的特质。七、八、九章是论,诸如北朝民歌着重论证民族风俗、地域文化特征,从不同角度深发和拓展了现有的研究层面;对北朝鲜卑文人诗、文的风格特征作了纵横比较,对风格成因作了民族历史文化、宗教文化,以及中原传统汉学等多方因素的剖析,因枝振叶,沿波讨源。十章至十五章着重阐述胡汉文化交流中的西北少数民族文学。对粟特文书、摩尼教忏悔词、突厥碑铭文、胡僧的译经文学等首次较系统的进行文学层面研究。以前学者对粟特文书、突厥碑铭文等只做了文字翻译文献考证,作者对这些文书、碑铭的文学特征进行多重文化剖析。西北少数民族文学无论用民族语言还是汉语言创作,他们都是北朝文学的组成部分,体现了密切的文化交流和文学方面的互动,影响着中国文学发展的轨迹。

作者指出,北朝文学不是精英文学,但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却格外重要,远远超出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为此,作者从多维视角,通过静态分析、动态流传、文学与文化、政治与宗教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发现北朝民族文人诗从模仿南朝诗坛的审美趣尚起步,又将北方多民族融合的人文精神和民族气质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到诗歌创作中。因此,北朝民族文人诗有别于传统文人诗,有别于南朝文人诗,在文人诗创作领域开辟了一条新路,创作出苍凉宏阔、沉郁雄健,富含北方多民族风情的诗歌。从并非经典的民族文人诗文创作中,作者探讨北朝文学发展的进程与步履,把握他们的脉搏与律动,说明了少数民族文人起到的胡汉文化交融的桥梁和先导作用,把拙朴浑厚的文学美学特质带进了诗文殿堂。通过这样的梳理,引导读者对于北朝民族诗歌创作的价值作出全面公允的

评判。文学美的形态风格是多样的,犹如玲珑剔透是精致的美,拙朴浑厚是混沌的美,精美强悍是干练的美,天真憨直是婴儿的美。考察诗文美学的流变历程,唐代诗人天真使气的歌唱,任侠尚武的诗风,正是北朝民族文人诗风的延续。

北朝民歌,反映了草原游牧民族对自然境界、生命境界、历史境界的理解,以及作为独立个体的人在这三种境界交织的空间里的存在意义。北朝民歌将游牧民族对人生的理解、歌颂、欢愉和对自然、生命的膜拜,体现在胡笳的旋律里和歌舞的欢乐中。先民们沸腾的情与爱,民歌超常的韵与美,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草原审美艺术。雄迈豪放、泼辣率直的民族个性,赋予这些发自肺腑的歌吟具有情真意切的精神特质,风雨不蚀的艺术价值。当然,还兼具有地域环境和民族风俗的史料意义。作者从民族婚恋风俗、地域生存环境,揭示那些发光散落在独特地域环境中、寄寓彰显于民族风俗里诗意之美。以游牧文化为代表的草原审美艺术和中原黄河文化互相影响,形成了审美观念上五方杂厝、风物浑然的特色。

作者还指出,古代突厥碑铭文的文学性,基于突厥碑铭文接受中原传统碑铭文的功用特征,同时也吸收了传统的突厥口头史诗的表达方式、题材内容等等,具有诸多口头史诗程式特征。又因为碑铭文与颂文在功能上的相似性,以及本民族文化的特点,突厥碑铭文具有较为鲜明的颂文特征。突厥文碑铭的史诗性、情感性、颂赞性等构成其显著的文学特征,也是突厥早期书面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北朝佛经翻译文学,作者执斧伐山、挈瓶入海,对佛经翻译文学的叙事特征进行梳理辨析,微辞奥义,金多发明,足以说明在北朝广为传布的这种佛经翻译文学的基本特征,对中国俗文学的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如果说“叙”是属于历时性的描述的话,则“论”,为共时性的论析,纵横开阖,发覆决疑。该著很多论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的范畴,譬如关于北方少数民族的源流问题,关于北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生环境问题,突厥碑铭的考察,关于西域胡僧译经及佛教传播中的胡汉文化交流,西域乐舞文化交流及其对中国诗词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等,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史的内容,也为中古文学研究平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我与高人雄教授结识于2004年的“《文学遗产》‘西北论坛’”上。我们一起探访北疆,辽阔的西北风情,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之幅员辽阔,民族之历史悠久。此后我曾撰写过几篇有关秦汉时期西北历史与文学的学术论文,无不

缘于这次西北之行。在那次会议上,我们曾与高人雄教授商议,有机会与西北民族大学合作,也承办一次论坛。经过悉心筹划,会议准备在2008年秋天召开。而四月震惊中外的汶川地震打乱原有计划。又过了两年,到了2010年初夏,“西北文学论坛”终于在兰州举办。会后还安排代表走访河西走廊,经武威,到张夜,访敦煌,进酒泉。祁连山下,戈壁风情,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长达一千多公里的河西走廊上,我们在长途汽车上谈论的话题,多与中古时期北方的历史与文化相关。这种实地的探讨,与书斋中的研读迥然有别。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场景里,不知不觉的,你就会融入到中古历史的长河中,那个时期的历史人物、重要事件,纷至踏来,让你感觉到历史的哭泣与欢笑,一种辽阔雄浑的悲壮感就这样油然而生。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氛围中,高人雄教授拿出了她的新著《北朝民族文学研究》打印稿,让我提意见。在河西四郡的几个晚上,捧读高教授的著作,北朝多民族文学的历史画卷就这样一一展现开来,联系到白天的实地考察,让我再一次领略到历史的苍茫,一种悠远绵长的历史感也由此升腾。

高人雄教授长期执教于西北民族大学,其为人,其治学,乃至其名字,都具有北方人的性格,巍然大气,而实际上,作者是典型的江南才女,秀外慧中。与她交谈,你会联想到流落江南的李清照,联想到她那首著名的诗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你还会联想到秋瑾,想到“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的著名诗句。阅读她的著作,更会给你丰富的学术启迪,会让你产生一种深入探究北朝历史文化的学术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很感谢高人雄教授,也为她的著作能够在中华书局出版感到由衷地高兴。我相信,一定还会有更多的读者与我有同感,进而对于魏晋南北朝历史与文化产生兴趣,结出硕果。

陆游《老学庵笔记》曾记载,苏轼为避家讳,为人作序皆用“叙”字,又改作“引”。这篇小文,作“序”自不宜,作“叙”又与书名重合,也不妥,作“引”,似乎较为合适,不仅引导我进入北朝民族文学,我希望有更多的读者与我同感,在高人雄教授著作的引领下,领略北方的辽阔与历史的悠远,还有各民族文学的无穷魅力。

是为小引。

2011年元月草于京城爱吾庐

北朝民族文学研究绪论

一、北朝民族文学研究的范畴与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自西晋灭亡(317)至隋代统一(581)的260多年,是北方地区的“五胡十六国”和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时期(本著统称为北朝时期)。在此期间,除汉族外,在中原建立政权的主要有匈奴、氐、羌、羯、鲜卑等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多集中在北方地区,他们之间彼此混战、兼并,促使民族文化不断的交流,不断的吸收多民族的文化因素,形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多民族的文化交融现象。西域于西汉时正式划入中国版图,魏晋南北朝时期(3—6世纪),各朝代对西域仍不时派出军队和官员,北魏相继于439年后经营管辖西域。古代西域,汉语与胡语即各民族语言在某些范围是通用的。研究北朝文学应该兼及西域文学。在这种多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北方诸少数民族文学即是北朝民族文学研究的范畴。

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北朝民族文学风貌,与南朝文学有很大不同,与传统的中国汉文学也有较大差异。史称晋室南迁,“道丽之词,无闻焉耳”(《宋书·谢灵运传论》),东晋文坛尚且寂寞,更何况北中国处于“戎狄交侵,士民涂炭,故文章黜焉……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传统文学出现了断裂。然而传统文学的断裂却为新型文学的发展带来了转机。北朝文学正是处于这种转机期,虽然文学成就远逊于南朝,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却十分重要。在唐代兴起或时行的变文、戏弄、传奇、倚声之词等莫不受北朝文学的影响。文学的交融带来了发展的契机,经过漫长的孕育到唐代喷薄怒放。

北朝文学别具风姿,另有一派魅力。不同的民族风情,新鲜的气息,鲜有传统束缚的创造精神……无不引人入胜。有不少优秀作品,千余年来脍炙人口,历久不渝。然而各种文学史著认为北朝文坛萧条,只有少数文人继承了汉魏文

风,或学习南朝文风创作了一些散文与诗歌。对北朝文学的论述主要集中于几位北方汉族或由南入北的汉族作家,民歌方面对《木兰诗》、《敕勒歌》论述较多,其它研究较为疏略。而且忽略了北朝社会十分活跃的佛教文学活动,没有深刻反映多民族融合时期北方真实的文学现象。对北朝时期西域地区(古代新疆)的文学更是缺乏关注。

本项目首次对匈奴、氐、羌、羯、鲜卑等及西域诸民族文学予以较全面的审视与梳理。对北朝时期借弘佛而盛兴发达的佛教文学,及其多民族性和大众化特征进行了论述。以微观分析为基础,宏观立论为目标,揭示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处于多民族文化交融阶段,各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对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诸少数民族的文学活动及文学发展的历史真况,及北朝多民族融合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意义,以弥补北朝文学研究中的不足。

二、北朝民族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早期的慕容鲜卑歌,毫无造作,生动反映当时社会生活。“鹞子经天飞”(《企喻》)的尚武豪情、“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陇头流水》)的战争苦难、“老女不嫁,踏地唤天”(《地驱歌》)的恸哭,血肉丰满,撼人心扉。其刚健的气质、活泼的基调,对以后唐诗风格产生深远影响。又如“弓无弦,箭无栝,食量乏尽若为活”(《隔谷歌》)等七言四句的七绝体、七言古体和杂言体诗丰富了诗歌形式。杂言七言密促的节律,为以后唐代七言歌行、律绝的盛兴积累了文化基础与创作经验。早期的慕容鲜卑歌作为诸燕乐府,多保留于北魏乐府中,北魏末年尚存五百余曲。随岁月变迁。慕容鲜卑歌不断流失,在周隋还和凉州乐合奏,到唐代只剩五十余曲。它们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慕容诸燕散文多为应用文,一些应用文写的比较完美,具有骈俪特点,说明慕容氏崇仰汉文化而且汉化较深。

前秦后秦氐羌文学、前赵后赵前凉等匈奴羯族文学,在“戎狄交侵”的北方社会起到了文化的传承作用。比较而言,前秦后秦氐、羌族汉化较深,文化水平较高。所创作的应用文与同类东晋文相比毫不逊色,作为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能写出如此水平的应用文,显示出了一定的文学造诣和文学素养。从应用文创作,也可看出氐、羌文人对文学、历史掌故较为熟悉,在应用文中大量引经据典,设置生动形象的比喻,显示出文采和气势。虽然前秦氏族文学作品多已遗失,但我们仍可从他们的应用文中以一斑而窥全豹,略知前秦氏族文学创作的整体

水平和风格。氐、羌文学相比较,则氐族成就高于羌族。苻朗诗文学作品,代表了前秦氐族文学的最高成就,其寓言故事和格言诗富含哲理,有中国传统的因素,也有非传统的精神。

匈奴、羯胡文学状况略同于氐、羌。匈奴建立前赵、夏、北凉等政权。前赵刘氏以华夏民族的正统传人自居,为君临天下找历史依据。从现存应用文字看,文学上体现了对汉魏文风与汉魏中原传统文化的继承,尤其刘聪子刘易文笔干练简约,行文引经据典,颇持儒家治国之论。沮渠蒙逊、沮渠茂虔等北凉文人、赫连勃勃等夏的文章亦颇承汉魏体制。羯族与西域胡人渊源关系密切,信仰祆教,敬西域胡天神,也更热衷西来的佛教。相对而言,石赵的汉化较低,但亦“颇慕经学”(《晋书·石虎载记》),反映出了汉文化对其的影响。所以一些文书亦趋于骈俪化,也能援引典故。

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等鲜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过重大影响。学界对拓跋氏作家群体的研究较薄弱,未有对作家作品集中的整理分析。本成果对北魏皇室文学作家及作品进行尽可能全面地审视与研究,阐释分析皇室初期文学的特征到后期文学的成就。梳理其文学风气的形成,促进文化发展的意义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北魏立国之初,拓拔鲜卑汉化较浅,至元宏执政大力推行汉化,倡导文学“洛阳之下,吟讽成群”(《文镜秘府论·四声论》)。拓跋鲜卑与汉族文人唱和时有佳作,如孝文帝与彭城王元勰、郑范、郑道昭、邢峦、宋弁君臣联诗:“白日光天兮无不耀,江左一隅独未照。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内外。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可看出倡导文学创作的风气。孝文帝的《祭嵩高山文》、《吊比干墓文》等辞赋类作品,文笔娴熟,声调和谐。尤其《吊比干墓文》“引雄虹而登峻兮,扬云旗以轩游”,夸张描述绘影绘形,篇章波澜壮阔跌宕有致。楚辞浓墨重彩,酣畅淋漓的风格为鲜卑拓跋文人所借鉴。可以看出鲜卑族文学的发展进程。

北朝文人多以建功立业作为自己人生价值体现,北魏文人对公牍文的创作表现了极强的热情和兴趣。拓跋文人作有大量公牍文字。“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颜之推《颜氏家训》)经国文翰为创作之主流,帝王也高度重视。孝文帝认为公牍文应辞无繁华、理从简实,内容上强

调务实。这种公牍文风格上力求朴实,与南朝要求骈俪华美的“俱为悦目之玩”(萧统《文选序》)的表奏书誓符檄之类不同。北朝文人和拓跋皇室文人向南朝文学学习的同时,具有不同的文学追求与鲜明的文学特点。

在多民族文化融合时期,北魏拓跋文学以汉文字语言从事创作,对于促进文化融合和北方总体文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南方地区沿东晋文学一脉而下,生机勃勃,北方地区的文学则正处于断裂带上,“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按照南朝的文学观,军政文翰难以文学目之,但就少数民族的自身文学发展而论,它们是极度飞跃了,可以说,它填补了鲜卑书面文学的空白,提高了他们的文学水准,促使北朝文学走向繁荣。

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实际掌握政权的高氏和宇文氏集团随后取而代之,分别建立了北齐、北周。崇尚鲜卑文化的鲜卑六镇军人的代表高氏是鲜卑化了的汉人。北齐诗歌以歌颂少数民族生活和北方生活为主题,语言更为质朴,景象开阔,意境宏大。北周宇文氏等民族诗人虽摩尚庾信,但北地文化的精神始终熠熠生辉,其粗犷质朴的气质使诗歌独具个性。正如北魏文化艺术的风格是稚拙朴素、端庄方正,得自然之妙,它集中在佛教摩崖造像及魏碑上。这种艺术风格体现了北方社会拙、重、大的主体气质,大则表现其声势,重则突出其份量,拙则代表了艺术上的取向。而这种艺术精神同样也反映在文学上。虽曰南风北进,北魏文学渐染南俗,然终具北风,沉郁苍劲之气十分明显!如宇文招《从军行》:“辽东烽火照甘泉,蓟北亭障接燕然。水冻菖榆未生节,关寒荚苑不成钱。”将多次的征战经历写入诗中,风格苍劲。满天的战火硝烟,苦寒的气候条件,凋敝的民生景象,经历过战争的人都能引起共鸣。

以北魏、北齐、北周等拓跋、宇文诗人为例,他们的诗作内容包含述怀咏志诗、应制酬唱诗、风月言情诗,模仿与问答诗等等题材,由于北朝后期较重儒学,受诗教的影响,脱去了早期民歌“老女不嫁,踏地哭天”的放纵,体现了温柔敦厚的迹象,但内在质朴依然存在。诗歌多建安文学的慷慨,少江左文风的绮靡。诸民族作家是文学融合交流的纽带,他们向北方汉族文士学习交流,也直接或间接效仿吸取南朝文学,同时又反映出自身与生俱来的民族特质。较之南朝文学,往往内容比较充实,散文多军政文翰,诗歌多反映现实。研究他们文学活动与创作实践,是揭示北朝多民族文学融合与发展特质不可或缺的环节。

北齐北周的诗作风格勃发豪气,魅力独具,鲜卑诗歌在周、齐文学中同样占据重要地位。随着南朝文风北渐、南方文人入北,文化融合加深,鲜卑宇文氏等

少数民族文人文学水平不断提高,为隋唐统一王朝的文学盛兴奠定文化基础,北朝诗歌也成为了隋唐诗歌高潮的奠基石。

西域早在商代与中原就有密切的联系,至西汉正式划入中国版图,中原与西域的关系更为密切。魏晋南北朝时期(3—6世纪),各朝代对西域仍不时派出军队和官员,北魏相继于439年后经营管辖西域。古代西域,汉语与胡语即各民族语言在某些范围是通用的。研究北朝文学应该兼及西域文学。

粟特人以经商著称,《魏书·西域传·康国》条记:“诸夷交易多凑其国。”伴随着大批商队的往来,诸种文化也得到传播。粟特文书反映了粟特商人以凉州为大本营,前往洛阳、邺城、金城、敦煌等地进行贸易的活动。信札综合了商业文书与书信文体的优点于一体,简洁明朗又不失生动流畅。以华丽的赞美之辞、虔诚的祝福之语开头,体现了粟特人的文学语言特点。

古代西域民族信仰摩尼教后出现了很多文学著作,其中大部分是诗歌作品,它们大部分是生活在吐鲁番地区的摩尼教诗人用回鹘文写就或翻译的。吐鲁番的维吾尔先民受粟特商人和传教士的影响在粟特文的基础上创造了回鹘文,并在公元422—488年间开始使用该文字。维吾尔佛教思想和文学作品中有关宗教术语不是借自梵语而是粟特语,通过在文献中使用的一些从摩尼教进入佛教的术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摩尼教对古代西域民族佛教文学的影响。

突厥汗国兴于北朝,衰于唐代。古代突厥——回纥时期突厥文碑铭的内涵丰富,不仅是对突厥、回纥汗国的建立及其历史文化的见证,可与汉文史料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突厥碑铭文的发现和解读,可直接看到突厥、回纥与中原北周、隋唐之间的关系,与中原具有形似的历史文化根源。而且通过古代突厥文碑铭我们能够了解古代突厥文的文学特点,诸如文体特点、语言形式及情感特色等方面的突厥文学信息。突厥回纥汗国时期的突厥文碑铭作为早期文学的表现形态之一,属于作家文学范畴,以传记的形式表现了瞰欲谷、阙特勤、毗伽可汗、葛勒可汗等英雄人物的丰功伟迹。悉心研读这些碑铭,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这些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了解他们的英雄事迹,同时也可窥到作者的叙事策略以及潜藏在作品中的独特的情感特征和地域特色等。

北朝佛经翻译活动也是西域与中原文学交流的过程。佛教起初主要通过安息、康居、于阗、龟兹等西域诸国东传。先兴起于北方,既而牵动江左;先以西域胡僧为主导,既而僧士合流。在佛教本土化的过程中,佛经文学的艺术品质也流入了中国文坛,并影响着文学的发展。根据中西学者考证,佛教当在西汉以前已传入中亚各国,通过西域再传入中土的佛教文化,已融入了诸多西域民

族的文化因子。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土初期,译经活动极为频繁,主要传译者是西域僧人。不断有“西僧”来中国传教译经,把印度大小乘经典陆续介绍到中国。西僧东来的同时,中土僧人西去取经,在译经布道过程中,不断切磋经义,推敲语词,进行语言文化、思维形式,乃至文学艺术等多方位的沟通,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融。西域胡僧翻译的经文,本身就是借助文学的形式来阐述经义,既是一种宗教活动,也是一种文学活动。凉、洛等地一度成为译经传教中心。集名僧名士合译经文,译经、讲经之人动辄千计。这种受宗教目的驱使的文学活动,一度成为最普及、最广泛的文坛现象。

佛经翻译文本是在原创蓝图上的再创作,既有蓝本的艺术特征也有翻译中再创的艺术结晶。早期的经文口口相传,讹误频出,因而译者的再创因素较重,所以佛经翻译文学,也是译者的文学造诣和创作成就。

佛经翻译文学具有鲜明的叙事文学特性,想象丰富,情节生动,故事性强,叙述风格铺陈丰繁,表述语言生动优美。如《阿弥陀经》、《法华经》等大乘经典,宛如一部佛教长篇小说。佛经翻译文学的叙述方式极为灵活,有偈颂、散文、故事、譬喻、直叙、问答等多种形式,因此佛经之中多种文体夹杂,各有特色。僧人布道往往讲唱结合,形成了经文韵散结合的叙述特点,韵文部分的内容又常是散文部分的概括和重复。广为流传的佛经翻译文学对后世小说、说唱文学、诗歌,乃至文字语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域翻译家、文学家、佛学家鸠摩罗什,被后秦迎请到长安,进行大规模的译经活动。东汉至魏晋以还,经文“支、竺所出,多滞文格义”^①,或囿于语言,只取直译不能融会贯通。鸠摩罗什于是重新校译,使“义皆圆通,众心惬服,莫不欣赞”^②,并常与沙门僧睿等“论西方词体,商略同异”^③,在译经的再创作中,追求文学艺术的完美。鸠摩罗什翻译的《妙法莲华经》,以佛陀讲述《法华经》为主线,串起大大小小的故事,情节曲折,构思精巧,具有很强的文学艺术性。叙述语言优美,联想丰富,以复迭、层递等艺术手法,营造了繁缛华美的艺术世界。佛经文本,作为特殊背景的文学样式,自前秦以来广泛流传。译经不仅是宗教活动,也是文学活动。佛经文学风貌也是北朝时期一种实实在在的文学风貌。参与人之多,影响之大,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不容忽视的。不仅佛教经过本土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诸如《妙法莲华经》之类的文学特性也不断与

①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52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传统文学风格融合,或丰富了中国文学风格,或影响了传统文学的风貌。

西域乐舞艺术发达,北朝时期乐舞文化交流极为频繁,西域音乐一度成为中国音乐的主流。延至隋唐,十部乐中,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高昌乐、康国乐五部均为西域乐,凉州乐是胡汉音乐交融的产物,西凉乐系《隋书·音乐志》云:“变龟兹声为之”,《旧唐书·音乐志》也载:“盖凉人所传中国(中原)旧乐,而杂以胡羌之声也。”太常乐、法曲、教坊曲也多胡曲。乐舞须乐、歌、舞三者并举,其中歌词属文学的范畴。为配合新声的演唱需要,产生了长短句(词)这一新的诗歌形式。源自西域乐曲的词牌名目繁多,丰富了文学艺术的形式。

慕容鲜卑歌给诗坛带来了剽悍的游牧文化的阳刚之气;氐、羌、羯、匈奴等的军政文翰与不多的诗文创作,体现了民族融合的文学底蕴;元宏等拓跋鲜卑文人的创作体现了民族融合中文人创作发展的进程;胡汉僧人译经中的思想交流与文学切磋,给传统文学注入了新的元素;西域僧人翻译的佛经文学为文坛增添了别致的风采。北朝诸多少数民族文人犹如胡汉文学交融的支点,起着纽带与关联作用,带动了北方多民族融合期文学事业的发展,也为隋唐统一王朝的文学盛兴奠定了基础。

三、北朝民族文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北朝民族文学研究,尝试从各民族自身文学的发展为切入口,不同于传统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视角,着重研究匈奴、氐、羌、羯、鲜卑等及西域诸民族的文学活动,尤其多民族文学的交流互动与融合。他们在汲取中原汉魏以来的汉民族文学以及先进的封建文化,社会不断进步的同时,又于多民族之间彼此交流相互吸收,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础。多民族间文学交流互进,各民族文学既有共性又有各自内在的特点。研究北朝各民族文学生动的现象、微妙的嬗变特征,方能深刻了解把握中国文学多元一体的特性。

本研究引入民族史学、社会学、民族文学研究等理论方法,分析诸民族在汲取中原汉魏以来的汉民族文学以及先进的封建文化、社会不断进步的同时,又于多民族之间彼此交流相互吸收,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础。多民族间文学交流互进,各民族文学既有共性又有各自内在的特点。研究北朝各民族文学生动的现象、微妙的嬗变特征,从而深入把握中国文学多元一体的人文特性。

文献引征除常规文史资料外,大量搜索征引了民族史学资料、中亚研究资料、敦煌吐鲁番文献、佛教文献以及近期考古资料等。主要引用汉文资料,同时

也尽量收集参考了外文、民文资料,并关注当今学界的研究成果,启迪思路。力争做到立论有据,评价客观,研究成果具有前沿意义和学术意义。

从各民族自身文学的发展切入,对北朝诸少数民族文学进行系统的审视和梳理,阐述北朝时期诸少数民族的文学活动及文学发展的历史真况。深刻揭示多民族文化渗透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意义,揭示北朝多民族融合的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意义以及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弥补中国文学史对民族文学研究的欠缺和对北朝文学研究的不足。发掘少数民族文学精华,弘扬优秀的多民族文化遗产,促进当今社会的人文精神建设。

目 录

小引	刘跃进	1
北朝民族文学研究绪论		1
一、北朝民族文学研究的范畴与意义		1
二、北朝民族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2
三、北朝民族文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7
第一章 十六国北朝诸民族社会文化		1
第一节 北方少数民族源流		1
一、匈奴		3
二、氐		5
三、羌		7
四、羯		8
五、鲜卑		9
第二节 十六国民族政权概述		10
一、前赵		10
二、后赵		12
三、前秦		15
四、后秦		17
五、前凉		18
六、前燕		18
七、后燕		19
八、西燕		20
九、北燕		20

十、南燕	21
十一、西秦	21
十二、大夏	21
十三、后凉	22
十四、南凉	22
十五、西凉	23
十六、北凉	23
十七、吐谷浑	23
第三节 北魏及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政权	25
一、北魏政权	25
二、东魏、北齐政权	25
三、西魏、北周政权	26
第四节 西域诸民族与柔然、敕勒、突厥	28
一、西域诸族	28
二、柔然与柔然汗国	31
三、敕勒	34
四、突厥与突厥汗国	35
第二章 诸燕慕容鲜卑文学	40
第一节 慕容鲜卑歌	43
一、鲜卑歌的文化背景	44
二、鲜卑乐府民歌	46
三、鲜卑歌艺术特色	59
结语	62
第二节 慕容鲜卑散文	62
一、慕容廆与前燕的散文创作	62
二、后燕慕容垂等的散文创作	66
三、南燕慕容德等的散文	68
四、西燕慕容泓慕容冲等散文	69
结论	71
第三节 吐谷浑鲜卑文学	72
一、吐谷浑政权及其社会文化	72